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编 / 季羨林



# 秋天里的春天

陈原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秋天里的春天

陈原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秋天里的春天 陈原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年3月1版第1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100册

定价:998.00元

##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 作者小传

【陈原】 1918年生，广东新会人。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并致力研究社会语言学。出版散文集有《书林漫步》、《人和书》、《书和人和我》、《黄昏人语》等，另有语言学专著多种。

# 目 录

作者小传 .....	( 1 )
秋天里的春天 .....	( 1 )
留下了鲜花 .....	( 5 )
科学断层 .....	( 7 )
文化断裂 .....	( 9 )
“秋来了!” .....	( 12 )
开明书店和我 .....	( 14 )
三联书店的杂志和我 .....	( 23 )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	( 29 )
“是的，您英明……” .....	( 33 )
西蒙诺夫的“证言” .....	( 35 )
《莫斯科日记》断想 .....	( 40 )
闹剧 .....	( 49 )
《东方红》 .....	( 54 )
悲剧性的“冲突” .....	( 58 )
爱罗先珂·胡愈之·鲁迅 .....	( 62 )
张元济与蔡元培 .....	( 76 )



## 秋天里的春天

秋来了，秋来了，秋来了三回，我就上了高中。一本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使我的大脑略为震动了一下：不是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的吗？怎么秋天里也会有春天？不料一看就迷上了。也许是被那个“温和地忧伤的罗曼司”事吸引了？也许是被那个中学生的天真打动了？也许被那个姑娘夏娃或者那个巴达查尔师傅的人格感动了？我那时全不知道。我找到巴金的美丽的原文，跟巴金的美丽的译文对着读，一章一章，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细细地读。中学生说，“像这么美丽的春天，像这个秋天里的春天这么美丽的，永不会再来了……”教员巴南约席却说，“春天会来的，还会有许多美丽的春天！……”年轻的我宁愿相信教员的话，但现实又往往让人失望。尽管如此，我的心还是向着巴金在1931年译者序中那一句充满希望的话：“在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说真的，在其后许多年间，我确信春天藏在真正的人的心里，藏在真正的人的平常生活里。否则在这残酷的不公平的人间，就活不下去了。



在第一次接触这部“温和地忧伤”的小说后二十五年，我有幸在哥本哈根一个丹麦工人的极其狭小的屋里，跟这部小说的作者巴基会面。我向他表达了中国读者对他这部小说的爱恋。他是高兴的。在那瘦瘦的脸孔上泛起天真的笑容。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世界，人民，战争，苦难，解放，……许多平常的见闻，普通人的感想。时间已销蚀了几乎全部记忆，但是巴基那天问我的一个极普通的问题，却长留脑际。那天，他忽然问我，你们那里有皮鞋吗？百货公司有皮鞋出售吗？贵吗？你买得起吗？老实说，他的问题使我大大吃了一惊：原来他来自解放了十年的匈牙利，我则来自解放没几年的中国。那时都叫做人民民主国家，人们说，这是新型的国家，这是老百姓当家作主的国家，这是从多年残酷的战争和压迫的废墟上兴起，创伤还未完完全愈合的国家。我说，有的，我们那里有的是皮鞋；一般人都买得起。我并没有吹牛，这是实情。他没有说什么。显然，那时的匈牙利不容易买到皮鞋。关于皮鞋的谈话以A·卡普勒（《列宁在1918》的作者）笔下的华西理那句俏皮话结束：“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与巴基会面二十年后，我到了布达佩斯。那已经是1985年。我住在郊区耐伊曼信息研究所。出了研究所大门不远，便有一家四层楼高的集贸市场；匈牙利在东欧国家中改革最早，特别是农村改革得很有成效，因此这个市场里的农产品确实十分丰富，应有尽有。走不多远，是百货公司。我特地进去看看有没有皮鞋，有的。非常好的皮鞋。我买了一个真皮的旅行包——早一年我在莫斯科最大的百

货公司即叫做 rym 的那家，见到苏联人排着三四圈的长队，为的就是抢购这种匈牙利皮包。于是我想起了巴基，想起了那次关于皮鞋的对话，想起卡普勒那句名言，心中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虽然那时正是秋天。

但是巴基早已逝世。否则我们还可以再作一次关于皮鞋或不是皮鞋的对话。巴基辞世时（1967年），我还被戴上高帽子穿上黑背心挂着黑牌游街，所以他的死直到开放年代才知道。他是够幸运的，第一次大战，当过俄国的俘虏，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上受难；第二次大战，他躲开了上前线，在饥饿中熬过了黑暗的日子。他是幸运的，他67岁死在床上。而卡普勒，30年代曾经以两部描写列宁的电影文学脚本走红，据说在战后某次肃反中“消失”了。确乎不确乎，不知道。

从布达佩斯回来，我又一次找出《秋天里的春天》，巴基的原文和巴金的译文对照着细读了一遍。虽然不是中学生了，仍然十分喜欢这部“温和地忧伤的罗曼司”。恰巧有别的事要请教巴老，我写信告诉他，我依然十分喜欢《秋天里的春天》。我没有说，有受难的日子里，是这部小书给我希望；造反英雄手下留情，没有抄走巴基的原文本。

我完全没有意思要麻烦巴老回信，想不到巴老很快就给我寄来这部小书的港版，另外还有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段：

记忆力衰退，朋友来信，因手抖无法回信，常常

一放就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您的信我找了两次也找不着，幸而我还记得内容，有两件事：一是在世协（按：世界语协会）新班子仍然挂个名；二是您喜欢《秋天里的春天》。关于第一点，我同意。您看怎样好，就怎办。关于第二点，我高兴，我也很喜欢巴基的这本小说。八六年我最后一次修改了它，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我得把这个改订本送给您，希望您提点意见。新译本（改订本）刚刚在香港出版，我得到了样书，现在挂号寄上，请查收。收到后请给我写封短信，以后还可以寄几本书给您。

书一到我手中，便迫不及待地重新读了一遍——当然立刻就写了回信，那信表达不出我激动的心情。巴老那拳拳之心，连同巴基那诚恳的天真的声音，还有这本令我眷恋了半个世纪的小说，那师傅，那中学生，那少女，那教员，那忧伤，那希望，一齐涌上心头，化成一个秋天里的春天。

春天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

1994年

（原载《读书》）

## 留下了鲜花

一个强大的“帝国”像庞贝古城一样，倏忽之间崩溃了；人说，那个地方如今又穷又乱。曾经那么文明，那么有教养，那么“辽阔广大”、“人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的大地上，留下了什么呢？我不能回答这个困扰着我多时的问题，因为我没有机会去亲自看一看。

一篇报道使我高兴：留下了鲜花。“没有钱财也富有”，题目就这样写着。这是赵启强先生的《出访见闻》（载《南方周末》1994年8月21日）。

在莫斯科。“常常在街上、在剧院、在地铁车厢里看见手持鲜花的人——各种年龄层的人都有，他们穿着整洁、体面……尽管这小小的一束鲜花并不是送给你的，但你能感受到一点温馨和亲切，那感觉与遇到提警棍的警察，持大哥大的商人和提着糕点、酒瓶的送礼人是那样的不同……”

这篇短短报道描绘了几个生活中平凡的场面。然而那是多么感动人的场面！

到亲友家去做客。“带上三枝鲜花，走进门献上花，轻轻地贴贴面颊，于是客人把春天带了进来……”

情人们约会。“递上一枝红玫瑰，轻轻地拥抱，于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便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开端……”

在剧院，演出结束了。“许多观众将大把大把的花束，或由孩子，或交剧院工作人员，或亲自送到舞台上……这是最为动人的场面……”“这不仅体现了莫斯科人对文化艺术的崇拜，对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尊重，也充分表现出莫斯科人上剧院不是去消闲，去摆阔，而是去学一门极为重要的功课——人的功课。而孩子们在这儿受到的文化洗礼，是他们初次被艺术女神抚摸和拥抱后，所激发出来的对美和对善的激动……”

有点抽象，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是不是？最使我震惊的是，莫斯科今日居然留下了鲜花。但我确实在这个现代“恐龙”解体前夜，在莫斯科，亲眼看见一对又一对的新郎新娘，新娘披着白色的婚纱，新郎衣襟上别着红花，到红场步行，拍照，到无名烈士纪念碑的长明灯火前，献上一束鲜花（这篇短文也这样写着）。我也确实看见过做客，并且做过客，看见过剧院献花，看见过普通人手上的鲜花……

70年的教养总会留下一点什么。政治结构可以瓦解；群体结构可以改变。甚至旗帜也可以变色。但是，70年的教养，70年积累的文化素养，70年的文明和现代化的气息，总不会一下子就烟消云散的罢。

1994年（原载《读书》）

## 科学断层

古代许多重要的发明都起源于中国。

科学史学家普遍同意，公元1400年以前，科学转让主要是由中国传向欧洲的。

虽然中国古代技术如此进步，可是，到1600年中国科技却已远逊于欧洲。

这是杨振宁博士在一次演讲中（1993年4月27日，香港大学）说的。1400到1600年是明永乐到万历年间。可是我们没有；忘记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南洋）是在1605年至1607年。

可否这样说：至少17、18、19这三个世纪中国科技发展突然出现了断层，至少有三个或多过三个世纪的科学或科技断层。为什么？

有些历史学家或有些社会活动家或职业革命家曾经简单地给出答案：因为封建制度！那么，1607年利玛窦跟徐光启译出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上篇，而下篇的译印为什么却要等二百五十年以后？

在那次演讲里这位科学家也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答

复。他只说，那段时期是一般知识在中国停滞不前的时期；他也说，这时期最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学说，并没有对中国思想或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真正的长远影响。作为中国科技史泰斗的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也没有给出确切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个民族出现了科学断层（或者甚至说，文明断层），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灾难；也是后人极想探究的现象，这当然是个十分复杂而难于用简单化的方法去解答的问题。玛雅文明到了高峰突然消失，或突然绝灭，世人探索了一百几十年，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我们的科学断层没像玛雅文明突然消灭那么复杂，但还需多科性综合考察研究才能得出不片面的合乎客观现实的答案。

1994年

（原载《读书》）

## 文化断裂

一家报纸报道词典的出版官司时，提到了“商务印刷馆”。不是商务印书馆。

差不多同一段时间，一部电视剧中主角说“商务印刷馆”字也节约了，离开商务印书馆更远了。

顿时使我想起了绝灭文化的那十年间。我亲眼看见工宣队或类似的组织成员，在这家老字号门口刷的大标语，写的是“商务印刷馆”，而不是“商务印书馆”。

这是偶然的“手民之误”吗？不是。也并非个别人没有文化所致。这是一种现象。这是时代的悲剧。这是十年浩劫绝灭文化政策的后果。

乍看只是一个字写错了。然而问题却不是单单一个字。比如“俄罗斯”不会三番四次错成“俄罗盘”（罗盘在成年人脑海中也有牢不可破的实体观念），“北海公园”绝不会写成“北海公厕”（虽则“公园”和“公厕”都是任何人的大脑信息库中永存的两个完全不同语义的概念）。

然而在文化绝灭政策或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人的信息库已被迫消除了某些东西（概念，观念，以及某些



存在物)的记忆。这就是文化断裂。这就是文化断裂现象。区区印书馆成了印刷馆，不过是其中小而又小的例证罢了。

为什么要消除“商务印书馆”这个概念？因为它创办于1897年，它出的书（包括教科书，词典，整理古籍，翻译西学）曾经教育了我这一代人，我之前一代人，我之后一代人。它是文化。要消灭这个牌号所象征的全部文化，就要从下一代或这一代最没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人中消除这象征的记忆。有这么严重么？小题大做么？请看那个年头，来自名牌学府的无知或装作无知的红卫兵在狂热的类似宗教崇拜的迷惑下，在这家老字号门口贴的对联就思过半矣。对联云：

庙小神灵大 池浅王八多

横批是“牛鬼蛇神”。把一个在大半个世纪为文化积累作出贡献的事业，归结成这样一种可恨可憎的应当消灭的东西，“印书馆”变丁“印刷馆”岂不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么？

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证明：文化这个复合体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凝聚作用和向上作用——它团结全社会成员为着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最佳的奉献；既然如此，它，文化，这个复合体，必定是不可断裂的，必定是连绵不断的；要是外力迫使它发生断裂现象，那后果将给这个群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灾难性后果将持续一个或几个世代之久。